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制度变革与国家转型

1946 年政治协商会议研究

于秋兰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博士文库

制度变革与国家转型

1946 年政治协商会议研究

于秋兰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制度变革与国家转型:1946 年政治协商会议研究/
于秋兰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ISBN 978-7-208-12429-5

I. ①制… II. ①于… III. ①中国政治协商会议
(1946)-研究②社会转型-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K266.207②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46478 号



制度变革与国家转型

——1946 年政治协商会议研究

于秋兰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8.75 插页 4 字数 237,000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2429-5/D·2519

定价 40.00 元

内容提要

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是近代中国国家转型史上的重要节点。本书回顾和梳理了近代以来国家转型的探索与实践，以制度变革与社会革命这两大路径选择为视角，对政协会议的发生与发展进行了研究。政协会议以政党协商、和平转型为原则，讨论了宪法、政府、国（民大）会、军队等构建现代国家的基本问题，在制度创设方面体现了极高水准。当时情况下，政协会议本可以成为中国的“制宪会议”，但最终由于国民党的反复及时局变化而不了了之。它的失败说明，在多元政治结构没有形成、变革方案没有经过充分博弈之前，制度变革推动国家转型很难成功。同时它也深刻影响了以后的政治进程，从《中华民国宪法》到1949年新政协，国家构建只有遵循它的精神才是合法的，是符合人民意愿的。

作者简介

于秋兰，女，山东青岛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培训部教师，法学博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毕业，研究方向为政党理论与近代中国政治，曾在《探索与争鸣》等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十余篇。

制度变革与国家转型

1946 年政治协商会议研究

序

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惘然

陈明明

在我的学生中,对民国政治怀有兴趣的不多,以1946年政协为论文选题的更少,这一方面是因为关于这个事件已有不少研究作品问世,想超越他人委实不易,另一方面是因为这段历史对于强调当下意识的政治学又显得过于久远,沉在故纸堆里无疑是对心性的砥砺。不管怎么讲,秋兰当初选定做这个题目是有挑战性的。令人欣慰的是,秋兰把政治学的理论和历史学的理据融汇起来,从纷繁复杂的党派政争中勾勒出国家转型和制度变革的主线,揭示了近代中国国家建设成败的前因后果,拓展了我们对历史、革命与国家的认知视野,她的叙述和分析不无新意,工作是有价值的。

1946年在重庆召开的政协会议曾经寄托着战后中国人重建国家、走向新政的希望,会议关于如何实现从训政体制到民主政体的过渡所设计的程序在制度创设方面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似乎只差一步就可成就类似美国费城会议那般的“中国制宪会议”的千古美名,却不意受挫于内外政治的反复,终毁于两党相争的战火。重庆终究不是费城。三年半以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开幕,时人谓之“新政协”,从此中国便有了新旧政协的专有名词。当然,1946年的政协不是1949年的政协的前身,此旧与彼新并无传承关系,不过,历史的断裂不等于思想的断裂,作为一份历史遗产,旧政协留下

了许多发人深思的东西，仍然可供后人细细咀嚼，温故知新。

“谈出来的国家”与“打出来的国家”

在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美国是一个影响很大分量很重的国家。孙中山早年为兴中会制订“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誓词，“合众政府”就是以美国为摹本。中共二大纲领关于“中华联邦共和国”的建国构想，思想上除了受惠于列宁的“民族自决权”和共产国际的东方革命理论外，威尔逊的“民族自决权”倡议和美国的联邦体制恐怕也是重要的来源。抗战期间不惟自由主义者对美国民主制度多有溢美之词，共产党人亦不乏称颂之语，如延安新华日报的多篇社论和评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民主的美国”是怎么来的？前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资中筠先生说，是谈出来的，“美国一开始立国就是讨论出来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这样的”。^[1]事实上，美国立国之初并非全然没有武力，所谓“莱克星顿的枪声”就是明证，北美的独立战争确定了邦联的框架，这才有了后来的制宪会议和联邦体制。内战其实是许多走向现代建制的国家都经历过的事件，即使在美国制宪者们的故乡——英国，其“光荣革命”多被人们视为权力更迭和平演进的典范，中间也是流了一些血的。区别只在于，内战是国家抵御变革的宿命，还是国家通往新生的阵痛？美国这样的国家显然属于后者（独立战争严格说不是民族间的战争，而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内部海外移民和母国统治者的内战），战争并没有改变百余年前“五月花号”从西欧带过来并移植于新英格兰地区的法律传统、宗教精神、契约准则和社会治理结构，虽然有“自由之花必须用爱国者和暴君的鲜血浇灌”这种激烈的话语，但总的说来，这些制度结构及其背后的文化大大限制了内战的范围，中和了内战的烈度，成为内战后新国家的立国之基，所谓“谈出来的国家”就是指奠基于这种结构之上的通过辩论、妥协、投票最后产生的美国宪法，这个宪法确立的国家原则和制度历经

两百多年而不坠，的确是人类政治生活的奇葩。

和“谈出来的国家”不同，历史上包括欧洲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是靠武力征服建立起来的，即“打出来的”，其中以中国最典型。王朝更替、江山易主，“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2]一部中国史，就是“打出来”的历史，这成为中国政治根深蒂固的特征。政权的变换依赖“开打”不靠“和谈”，个中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宗法农耕社会的统治天然地是家天下的统治，家天下的特质是排斥性的，权力的封闭性和刚性极强；其二，家天下的权力是不受约束的，权力的专横和任性迟早导致信息传输的失灵和统治能力的衰减，从而客观上为“变天”（“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提供了诱因和理由，为国家的崩溃准备了条件；其三，由于家天下的权力不会自动放弃，也不能与外姓他族分享，要想得到天下，只能拿命来换，所以权力的觊觎者或王朝的造反者必然以剑戟开道，以武力决胜。

随着近代民主思想和共和政治的传入，中国的历史似乎发生了某种改变。孙中山在辛亥革命结束不久，认为中国的民族、民权两主义均已告成，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需要进行社会革命。“社会革命尚须用武力乎？”他的回答是：“英美诸国社会革命或须用武力，而中国社会革命则不必用武力。”^[3]孙中山设想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民生方案“不必用武力”，即不用剥夺手段，而北京国会的开张似乎也昭示着中国传统政治逻辑开始退出历史舞台的前景。但是，到孙中山辞世，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都没有落实，民生的问题更无从谈起。民族主义要求外争国权，建构主权独立民族国家，但旧的不平等条约未废，新的民族危亡又已来临；民权主义要求内惩国贼，反对“封建专制”，实行民主统一，但军事割据、强人政治联袂而至，社会动荡、统治失序败像纷呈，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制度性障碍并没有消除。这就是邹谠所说的“全面危机”（total crisis）。^[4]为摆脱全面危机，1921年，信仰共产主义的激进的知识精英组织了共产党；1924年，饱经北京国会挫折和挤压之苦的国民党效法苏俄实行改组；1925年，国共两

党合作共同北伐。于是,在中国,武力还是成了最后的上诉法庭。

20 世纪中国革命是在中国现代化的背景下展开的,无论是国共合作发动的国民革命,还是国共两党分道扬镳后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民主革命,都是试图以政党动员社会的方式,克服总体危机、建设现代国家的反映,并不是传统中国政治“汤武革命”的简单再版。从深层结构来说,中国革命的目的是为现代化缔造新的权威基础,它必定深刻触动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也和国内传统权势集团赖以生存的经济社会结构形成尖锐矛盾,这两个制度性因素是异常强大的。从过程和形式来看,1927 年以后,以共产主义革命为取向的中国革命集中表现为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党国体制和共产党红色割据的“国中之国”的对抗。要制服强大的对手,必须有更强大的力量。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就发生了……革命力量就非在长期间内不能聚积和锻炼成为一个足以最后地战胜敌人的力量。因为敌人对于中国革命的镇压是异常残酷的,革命力量就非磨炼和发挥自己的顽强性,不能坚持自己的阵地和夺取敌人的阵地。”因此,“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5]这是“开打”在中国始终压倒“和谈”的主要原因,也是 1946 年政协会议不能不流于失败的原因。在这里,以革命话语表达的大规模群众动员政治的确再现了中国政治的传统特点,但它的内容、任务和走向以及所处的时代具有了不同以往的含义。

历史结构主义中的“结构”与“历史”

秋兰在博士论文中指出,1946 年政协会议的召开,与抗战时期特别是末期特殊的国际背景密切相关,也和第三方力量的形成及其对国共两党的压力紧密联系。^[6]国共两党的回应反映了中国政治舞台上竞逐现代化领导权的历史主体的视野、品质和所能动员资源的能力,这些东西反过来又影响了形势和力量的对比消长,最终推动了

政治结构的转换。这令人想到了历史结构主义的分析路径。

什么是历史结构主义？在社会科学中，结构是指按角色组列的社会空间关系，这种关系是人们集体行动的产物，是人们先前历史互动的均衡解。结构体现在阶级阶层之间的政治社会权力的平衡上，体现在阶级阶层之间关系的稳定和可预期上。结构一经形成便具有强制性，结构的强制性通常表现为鼓励主体重复既有的行为方式，以及对试图背离结构的行动以挫折和失败为警示所施加的约束。另一方面，结构作为人们集体行动的产物，是会随着人们持续展开的互动而变化的，所以结构具有可变性。结构产生出各种矛盾和紧张，为促进变迁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可能性，反过来，人们的历史行动（表现为对各种可能性的选择，如趋利避害）也会对结构发生影响，结构的可变性取决于人们采取策略的互动形式，本质上是一个理性博弈的结果。

1945 年后的中国存在着三个结构：一是雅尔塔体系制约下的美国、苏联和中国的三边结构；二是以美苏为一方，国民党和共产党各为一方的三边结构；三是以国民党为一方，共产党为一方和第三势力为一方的三边结构。这三个结构具有两层意义：其一，头一个三边结构代表着战后的国际关系（对中国而言）；第二个三边结构代表着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关系的结合；第三个三边结构则纯粹是一个国内政治结构。国际关系对战后中国的影响（制约国内政治走向）一定要通过和中国国内政治关系的互动来实现。其二，三边结构中任意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三角形定理），换句话说，任意两方结盟势必压倒第三方。

先看第一个三边结构。1945 年 2 月雅尔塔会议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是敦促苏联早日加入对日战争，以缓美国在太平洋和东南亚对日作战的压力。1941 年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把中国作为对日战争的主要盟友，从地缘战略出发，希望中国与太平洋向西进攻的美军配合作战，打击日军。美国为此不仅主动放弃了在华治外法权，还帮助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但是国民党军队的战场表现令美国人十

分失望,国民政府大后方的腐败又激起了美国人的反感。为了以最小伤亡赢得战争,美国决定邀请苏联参战。雅尔塔关于苏军参战的秘密协定规定,参战的苏联可取得两项回报:外蒙古维持现状;沙俄时代俄国在中国的权益全部恢复,包括苏联在大连港的商业利益、在旅顺港的海军基地租用、对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公司合营优越权等。国民党政府知悉密约后,与苏联展开艰难谈判,为换取和苏联的单方面合作以遏制中共,蒋介石几经内心挣扎,不得不在外蒙古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随后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四个附件。在中苏条约签订的过程中,苏联获益最大,美国次之,中国(尤其是国民政府)备受羞辱,损失至巨。在这个三边结构中,美苏的“合谋”实际上制约到了第二个三边结构,给战后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从苏美两国的战略目标看,苏联除有意识形态考虑外,其国家利益是希望维持一个中立的民族主义的中国,以共产党牵制国民党,促使国民党奉行对苏友好、承认苏联权益的政策,在苏联与美国之间构造缓冲地带。美国的战略目标则是促使中国的自由化,建立一个以国民党为主、容纳共产党及第三势力的政府,软化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色彩,节制国民党的一党独裁立场,培植第三方的自由民主力量,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受苏联控制,与美国国际利益不冲突或照顾美国在华利益的西太平洋战略合作伙伴。虽然苏美两国战略目标不同,但战略交集也是明显的,这就是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以免危及战后的新秩序。无论苏联还是美国,都担心国共之争这个中国国内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打破美苏战后的势力均衡,尤其是美国,“从全局出发,同时为了避免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它既要维持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又希望通过民主方式推动国共联合,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形成真正的政治统一。”^[7]在这个三边结构中,美苏共同构成了制约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一边。这是分量极重的一边,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都不希望打破国共两党的竞争均势,因为国共两党的竞争反映了美苏两国的竞争。国民党和共产党在这个结构中能否争取到有利的地

位,取决于能否利用历史提供的契机,争取到美苏的支持或中立。

1946年政协会议就是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契机。抗战以来的战争动员和共产党在敌后发展,极大地挑战了自1929年以来国民党政府开始实行的训政秩序,党国面对民族危亡,为调动全国资源对日战争,不得不在一定程度放开党禁和报禁,不得不承认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政权的事实上的存在,从而在党国统治的千疮百孔的社会中成长起各种自主的异质的政治力量。抗战末期的宪政民主运动由此而生,这是政协会议能够召开的社会政治基础和历史背景。

政协会议对国民党来说只是一个咨询性的党派会议,在国民党看来,制宪之权在国民大会,它可以允诺提前召开国民大会来组织政府,却不能容许绕开国民大会谈制宪建国。“在国民大会召开之前,政府不能违背建国大纲,结束训政,将政治上的责任和最后的决定权,移交给各党各派,造成一种不负责任的与理论事实两不容许的局面。”^[8]简言之,国民党不想放弃一党独裁。但对共产党来说,政协会议固然是党派会议,也是民意会议,民意会议即“中国各主要政治力量代表会议”,既然是各主要政治力量代表会议,政协会议就具有和平建国、改组政府、整编军队、制定政纲、讨论宪草等关系到国家根本制度设计的性质。其中,抗战胜利前夕为争取战后有利的政治地位而提出的“联合政府”主张是共产党的一张王牌,它的核心诉求是“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9]蒋介石说“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10]站在国民党的立场看大体不错,联合政府的确是要改变国民党党治国家的政治结构和制度逻辑,其“颠覆性”蕴含其中,而党派会议的确是要变国民党独裁垄断的集权政治为各政治力量自主参与的分权政治,其“分享性”不言自明。

联合政府的主张在共产党那里并不违背其意识形态(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理据,对改良战后中国的政治结构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一个纲领和口号,它顺应了战后国际国内的民主潮流,^[11]在策略上较之国民党力图维持一党优势的霸权式政府更容易被美国主导

的国际舆论所接受和欢迎。这由马歇尔使华对外声称的意图可以看出——美国总统杜鲁门说：“我派马歇尔将军到中国去是为了设法制止战争，以帮助国民党和共产党签订协定，组织一个联合政府。”^[12] 1945年12月15日，马歇尔启程当天，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称“美国知道目前中国国民政府是一党专政的政府”，“假使这个政府扩大其基础，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力量的分子，那么中国的和平、团结和民主的改革才能推进。”还说“一党训政”——“中国国父孙中山先生在全国推行民主的过程中所创立的过渡办法”——“亟须修改”，^[13] 直接发出国民政府必须改组的呼吁。这显然对国民党不利。1945年12月27日，美苏英三国外长会议发表关于中国问题的联合声明，认为“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必须由民主分子广泛参加国民政府的所有一切部门，而且必须停止内争”，^[14] 宣布了美苏两国对华政策的一致性。在这个三边结构中，虽然美苏对蒋政府不无偏袒，但同时也逼迫蒋变革，国民政府承受的压力如影随形，处境维艰，正如蒋侍从室主管情报工作的唐纵在日记所言，这是一个“黑暗时期”，“政府始终在艰难困苦之中”。“在政治协商会议，政府好似在受裁判，其屈辱难堪，令人难受已极。”^[15] 较之国民党，共产党当然也有许多困难，但对联合政府的阐释和宣传使自己在道义和民意上逐渐占据了优势。许多人相信，“中共之政治主张，与英美之民主政治可以说大致相同，尤其对经济方面，主张企业自由与民主化，更非想象中之共产主义。”^[16] 舆论已经站在共产党一边了。

真正决定了国共两党命运的是第三个三边结构。共产党的战略目标是：第一步，在现有的结构中取得合法地位，通过改组政府而参加政府，发展民主力量，推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第二步，通过积极的政治斗争，壮大共产党的力量，最终取代国民党的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建立由共产党主导的社会主义的民族独立的工业化国家。国民党的战略目标则是竭力排除共产党的参与，限制共产党的扩张，以“新传统主义”的方式，即在维持国内既存

社会经济利益结构的基础上,建立国民党主导的三民主义的民族独立的工业化国家。作为结构第三边的第三势力的战略目标是,取消一党独裁,开放政治权力,建立欧美式的自由民主宪政的工业市场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第三势力其实并非以往人们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狭小的知识群体,在宽泛的意义上,它其实包括了民族工商业、农业和手工业平民阶层,是一个人口数量占据多数的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举足轻重的“中间势力”。^[17]关于这个中间势力,中共党史专家胡绳有一个重要观点,认为在国共两党竞争中,他们既可能追随共产党,也可能依附国民党,由于他们“自发顺着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他们站在哪一边要看两党谁能最大限度满足他们的要求。“假如有一个阶级、政党真正能实现资本主义,工农、小资产阶级中的很多人也可以跟着它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一定都跟共产党走。”^[18]也就是说,在一个经济、政治和军事结构尚能支撑国民党统治的国家体系中,人数众多的中间势力的走向对于两党竞争的胜败是决定性的,所以结论是,除非无产阶级把处于中间状态的广大社会群体争取过来,否则无以实现社会革命改造工程。

共产党争取中间势力的战略得自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论是关于中国革命的“上篇”与“下篇”关系论,在战略设计上,它认为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上篇),而后才能在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上开始社会主义(下篇),先有资本主义,后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必经阶段。共产党的宣传就是如此,它并不避讳向世人表达它终将把国家引向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毛泽东说:“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

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19]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通常被认为“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过从甚密,它只能在基本不触动西方列强在华利益和国内传统社会利益结构的范围内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又恰恰是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力量,这样它便与具有发展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中间势力形成冲突。胡绳的研究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谁能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谁就能赢得中间势力,谁赢得中间势力,谁就赢得中国。本来,1927年中间势力拥护国民党,是因为他们相信国民党有能力统一中国,建立起一个主权独立(抵御西方帝国主义)、政令贯通(制服国内传统势力)的现代国家政权,从而使中国走上独立的自由的资本主义道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结果到战后,他们发现国民党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而且国民党的训政导致党国太专断、太腐败,事实上在损害中间势力的利益和要求。相反,共产党虽申明最终要把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但积极“反帝反封建”,解决民族独立和土地问题,事实上在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一个公然提出社会主义目标的政党,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最终能把具有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的中间势力争取到自己的阵营,是历史结构主义中主体能动选择推动结构转换的范例。在这个三边结构中,反资本主义的共产党赢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中间势力的拥护——共产党和中间势力两边成功结盟,从而夹击被认为是代表“资产阶级”的亲资本主义的国民党。历史充满了反讽的意味。

“胜出”与“出局”:军事、组织与人心

1946年政协会议决议最终在国共两党战争中沦为一张废纸。政协会议失败的责任首先在国民党,因为国民党代表着所谓国家,政协决议能否落实取决于它愿不愿意放下身段,开放权力,容纳各党派的参与。国民党“当让不让,可和不和,应改不改,要做不做,还是迷

信武力，图以武力解决一切”(储安平语)，^[20]这就把事情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作为一个“执政党”，^[21]国民党不肯轻易让出政权，这好理解，问题是，国民党要维持这个一党独大的霸权政体，在战后的中国，在军事、组织和人心方面，还有多大能力和余地？

对于一个延续靠“开打”定输赢分高下的历史传统的国家来说，军事及其战略上的胜负是决定性的。按照海峡对岸的观点，国民党开局便在军事战略上棋输一着。^[22]以东北战局为例。抗战胜利时，国民党的精锐主力远在中国西南地区，东北可谓鞭长莫及，由于控制东北的苏军作梗，不同意让美军军舰运送国民党军在大连登陆，国军迟迟未能进入东北，加之国民党忙于接收江南、华南和华北等大城市，把这些地方视为其战后统治的中心地区，所以它的军事战略是“先安关内，再图关外”。1946年初苏军自东北撤退(是年3、4月完成)，为争夺东北接收，国共两党冲突再起。马歇尔进行调停，“提出了国共停战协议草案，主张一切军事行动停止，惟政府派兵接收满洲之行动，应不受牵制”，马氏这个方案鼓励和支持国民党占领东北，实际上把蒋原来的“先安关内，再图关外”之策倒转为“先图关外，再安关内”，结果如台湾国民党党史专家蒋永敬、刘维开所言，此后局势便只能是“关外既未图成，关内更不能安，成为无法挽救的‘一盘歹棋’。蒋被送上火炉……”^[23]

东北在国共两党的战略中的分量是不一样的。对国民党来说，东北只是一个外交问题，战略目标是收回“主权”以及迫使苏联不支持共产党，它的力量尚不够支持其在东北的统治，进驻东北各城市势必把战线拉得太长，陷入首尾不能相顾之境。但对共产党来说，东北是一个事关革命前途的存亡问题，“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24]所以必须“动员全力，控制东北”，以战争迫蒋“开谈判，迫他承认华北、东北的自治地位”。^[25]显然，蒋介石改变战略进军东北，而没有先固华北，已是一大败笔；及至东北战局不利而仍